

简析 1927—1937 年的浙江新闻事业

何扬鸣 冯章国

摘要：1927—1937 年是中国大陆新闻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然而，有关这个时期的个案研究却不多见。文章对那个时期浙江的新闻事业进行分析，认为那个时期浙江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同时还对浙江新闻事业的环境作了分析，认为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是与浙江比较特殊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这样的环境是大部分省份所不完全具备的。

关键词：1927—1937 年；浙江；新闻事业

作者简介：何扬鸣，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 新闻系，浙江 杭州，310028）

冯章国，男，记者。（《温州商报》地产部，浙江 温州，325000）

中图分类号：G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3-0010-06

众所周知，1927—1937 年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少论著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选择某一个地区作具体分析的论著似乎不多。浙江历来是新闻事业的先进省份，尤其是此时，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蓬勃发展的新闻事业中，浙江十分引人注目。^[1]然而在论述该段历史的论著中，浙江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这是十分不应该的。本文选取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原因作个案分析，希望能对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一些补充和说明，试图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认识，加深学术界对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论是杭州、宁波这些城市还是诸多县区，都创办了由政府提供经费的报刊，因此，这个时期浙江省的政府报刊是比较发达的，如《浙江省政府公报》《杭州民国日报》和后来的《东南日报》《杭州市报》《之江日报》《宁波民国日报》《宁波市政周报》《绍兴民国日报》和《浙瓯日报》等，此外，浙江绝大部分的县都有政府报纸。

这些报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许多还有不小的来头。杭州《国民新闻》创刊于 1927 年 3 月，办报人基本上是一些军人，报纸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亲自通知浙江财政厅拨给其办报经费，后来该报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提供经费，月补助费 1200 元。^[2]《湖报》是湖州的第一张政府报纸，创刊于 1929 年 5 月 18 日，是湖州地区影响较大的报纸。《湖报》设有董事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为董事长，报社的印刷设备和收音机都是他出资购买捐赠的。^①至于报刊请名人要人题写名字则更多了，如《湖报》的报名由于右任题写；1932 年创刊的《奉化新闻》的报头，为蒋介石所题；1935 年 5 月 27 日绍兴第一张晚报《绍兴晚报》的报名为陈立夫所题。

1934 年 6 月 16 日，《杭州民国日报》易名为《东南日报》。与此同时，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1932 年，萧同兹接手中央通讯社时，曾提出新闻事业要“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三大方针。^[3]《东南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有减轻

① 沙金编著：《湖州报纸史略》，浙出书临（92）第 128 号，第 11-12 页。

政府色彩形象而增加民办色彩的本意，以扩大销售市场，也符合萧同兹所提出的方针，不失为一种尝试和创举，开了政府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先河。

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人们纷纷投资入股，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张治中等。^[4]更令人关注的是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有张道藩、陈布雷、陈果夫、叶楚傖、陈立夫，董事长陈果夫，监事王廷扬、萧铮、郑文礼、洪陆东、潘公展。董事和监事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除了《中央日报》之外，很少有哪一家媒体会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后台。

各种条件为《东南日报》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机会。1936年，在杭州众安桥矗立起一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大楼，杭城为之轰动，这就是东南日报社的大楼。这座大楼不仅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当时全国报社中，不仅为《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报厦所不及，就连南京《中央日报》的新厦也为之逊色，是当时全国同业之首。这座大楼的造价是高昂的，其中一部分由国民党中央党务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提请中央财务委员会补助，蒋介石也曾允诺拨助一部分。

这个时期的报刊，并不局限于政治性的，各行各业都有，如教育方面，有《学校生活》《浙江小学教育》《浙大学生》《小学生》《中国儿童时报》《鄞县教育周刊》等。1930年6月1日，全国第一张儿童报——《儿童时报》在绍兴创刊，1931年9月该刊迁往杭州，更名为《中国儿童时报》。该报发行量最高达2.5万份，遍及江浙沪地区，还有不少旅居日本、朝鲜、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儿童也直接汇款订阅。1932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刊物整版介绍了《中国儿童时报》的情况。1935年，部分留日的中国学生组建了《中国儿童时报》东京分社。^[5]《中国儿童时报》在国内外的声誉不断提高。

那么，这时期的浙江有多少报刊呢？1934年，冷禅统计那时浙江全省日报92家，间日刊、三日刊或周刊20种。^①1937年5月，邵力子对浙江1934—1937年的报纸作过统计，分别为89家、98家、111家、105家。^[6]这两则数字是不准确的，因为在1927—1937年，仅杭州就有过七十多种综合性新闻报纸。^{[5](85-87)}但是即使按照这些统计数字，浙江当时报纸数量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中，也是一直名列第二，仅次于江苏。1927—1937年，浙江还出版过许多杂志，前后至少在170种以上，^②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这些杂志范围很广，各个门类都有，遍布各个机关、部门、学校、团体等。

需要指出的是，那么多报刊不都集中在几个城市里，各县甚至有不少镇，都出现过数量不等的报刊。浙江边远地区各县新闻事业落后状态有了彻底的改变，虽然它们与发达的城市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

报刊的遍地开花，促进了通讯社的较大发展。1927年到1937年，政府或民间先后经营过浙江民国通讯社、国民通讯社嘉兴分社、文艺通讯社、工商通讯社、商业通讯社、浙江工商新闻通讯社、工商新闻社、浙江商务通讯社、商联通讯社等十多家规模比较大的通讯社。至于那些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历时不长的通讯社则不计其数，遍及全省各地。据1934年的一个统计，那时浙江共有通讯社106家，江苏共有通讯社20余家，这些数字也只能供参考而已，是不准确的，比如杭州就先后有过123家通讯社，^{[5](146)}新闻事业相对比较落后的温州也先后出现过12家通讯社。^[7]众多的通讯社中，肯定是良莠不齐的，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为报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行业消息和社会新闻，是各个报刊地方消息的主要来源。

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外地报刊，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浙江的大量发行。20世纪30年代，杭

① 冷禅：《浙江的新闻事业》；马元放：《江苏的新闻事业》。刊《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年纪念特刊》，上海申时电讯社，1934年。

② 浙江出版史编委会编：《浙江出版史料》，1994年第15辑，第143页。

州除了有外地新闻通讯社所设的分社外,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天津的《益世报》,南京的《京报》,都在杭州设分馆、办事处、记者站。《申报》和《新闻报》还联合起来在杭州单独出《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日出对开4版,随报附送。外地报刊,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浙江的发行,加剧了浙江报刊的竞争,浙江报刊中一些竞争能力差的只好停刊。当然,外地报刊在浙江的发行,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迫使浙江的报刊在质量上下功夫。那时,浙江报刊质量的较快提高,与此是有关系的。

二

1927—1937年期间,内外战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停顿过,不过在浙江,原先战乱局面基本告别了。这10年中,工商业、运输业等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近代化的进程加快。浙江,尤其是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温州、湖州等地,商业历来比较发达。如宁波,药行业在1927年已经列全国药材业交易市场的首位;商店1931年有5599家,资金额1400多万元;宁波的金融业,尤其是钱庄业不仅列浙江省榜首,而且较之京津沪汉也毫不逊色。^[8]湖州的经济也相对稳定,1930年后,以蚕丝、织绸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浙江财阀”甚至还左右着上海经济。

工商业的相对发展和相对繁荣,为浙江新闻事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30年代,浙江新闻界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的报刊越来越多,为公司商号推广业务、推销产品的营业性广告在报刊上也越来越活跃了。1928年夏,由杭州各报广告部人员发起组成的杭州市日报广告联合营业社成立。该社主要承包杭州市日报广告业务,也承包各行号及其他一切广告业务。1937年6月,《浙江商报》还出版了经过一年多筹备的纯营业性广告册《浙江商报二十六年度杭州市公司行号年刊》。30年代,温州新办的报纸很多,都刊登了大篇幅的广告,且多占第一版,如《温州新报》《瓯海民报》《大公报》等,一、四版全部刊登广告,二、三版还占有一定位置,有时还有标题显著、图画醒目的广告穿插于新闻版面之中,广告几占整张报纸篇幅的一半以上。广告种类绝大多数为工商营业性广告,如商店开业、产品推销、影剧节目、医药卫生广告等。^{[7](125)}

这时期的新闻,经济消息、市场行情报道的比重不断增加,所以那时浙江的商业报纸杂志很多,如《绸商旬报》《民国周报》《硖石商报》《衢民日报》《平湖商报》《新商日报》《浙江商业日报》《工商导报》《台州商报》《浙江商务》《浙江工商》《萧山县商报》,等等。《宁波商报》内容以商业新闻和商业广告为主,设有“商情市声”、“经济新闻”等栏目,先后开辟了“杂货店”、“十字街口”等副刊;商业新闻将宁波渔业、药业、棉布业、金融业、粮食业等南北货业行情放在首位;新闻短、新、快、生动活泼,如《堪称黄道吉日,大队乌贼开到,更有黄中助威》等。该报还重视宁波外贸消息和国际经济动态。《鄞县商业日报》也以商业新闻和广告为主,重视宁波外贸消息,《商品统计》栏目专门介绍食品等商品近期出口贸易数量,《宁波市行市表》栏目专门反映市场行情,该报还经常发表通俗商业知识文章,如《如何训练店员》《店员须知》《商品介绍》《广告的价值》《我国浴室的副作用》等。

工商业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休闲小报在城市里逐渐流行起来,如《杭州小报》《杭州午报》《杭州晚报》《宁波午报》《宁波闲话》《宁波小报》《宁波小日报》《平湖小报》《绍兴午报》《温州小报》《温州晨报》《瓯江小报》《温州快报》《温州游艺报》等,数量不少,这表明市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生活的休闲。

1927—1937年,浙江的交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浙赣铁路的建筑,形成了以省会杭州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除少数县份外,全省均可通汽车,而且浙江与周边省市的公路交通网也基本形成。钱江

大桥通车，杭州与东南诸省联系更紧密了。虽然交通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浙江仍意义特殊。以杭州为例，杭州的报刊要冲出杭州和浙江，与上海的报纸角逐浙江西部、东南部及东南诸省，除了要提高自身的质量外，良好的交通至关重要。《东南日报》等就是靠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的改善，比上海报纸提前一两天到达发行地而打开销路，并逐步占领市场的。1937年6月，当《东南日报》展望今后的发展前景时，再次寄希望于“获日在进展中的铁路公路之营养”。^[9]

浙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浙江广播电台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1937年5月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广播电台78座，其中民办广播电台约55座。这些广播电台主要分布在江浙沪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其中江苏省（含南京和上海）43座，河北省（含北平和天津）7座，^[10]浙江至少有11座广播电台，^①地区分布于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考虑到排名第一的江苏是包括了南京和上海，浙江广播电台的数量是可观的。

1928年10月10日，浙江省无线电话广播电台（次年11月改名为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开播。这座由省政府创办的中波广播电台，水平相当先进，是南京政府期间地方政府所办广播电台中最早的一家，距在南京开播的第一座全国性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仅仅2个月。“省台”刚开播时功率为500瓦，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功率不断增加，到1932年为1000瓦，到1935年达到2000瓦，以适应浙西山区各县的收听需要。播音时间也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每天共两个小时，到1935年每天共6个半小时。^[11]另外，嘉兴县政府也办了一座广播电台，是浙江唯一一座县级政府广播电台。当时中国还有一座县级政府办的广播电台，为江苏武进县政府所办。^[12]

除2座政府办的外，其余的广播电台都是民办的。杭州亚洲无线电公司的“亚洲广播电台”、杭州电器公司的“杭州电器公司广播电台”、杭州敬亭无线电商店的“敬亭广播电台”、潘锡璋等5人合资创办的“宏声广播电台”，完全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它们功率不大，但是每天的播音时间却十分长，分别是8小时、5小时、15小时、11小时。其中，敬亭广播电台是用上海话播音，宏声广播电台是用杭州话和上海话两种方言播音。若要叙述杭州暨浙江方言节目的历史，其源头恐怕应该从这时期开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杭州的商业活动和城市生活的活跃。随着上海民营电台的发展，宁波收听上海广播电台的人数不断增多，有人开始创建宁波的广播电台。宁波先后有广播试验台、黄金广播电台、四明广播电台。

20世纪20—30年代，报刊的发行主要是依靠邮递，交通的好坏至关重要。浙江许多县镇，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交通往往不便，从杭州邮递的报刊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读者或订户手中。广播电台的出现，极大地弥补了报刊发行过程中过分依赖于交通的缺陷，重大政令和重大消息可以及时地传送到全省各地。如抗战爆发后，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与《东南日报》约定好，每天下午4时广播该报编发的号外，如有重要消息，电台则随时播送，以最快的速度将战时消息告诉全省人民。^[13]西安事变期间，省电台也是如此快速播发消息的。

三

考察新闻事业发展的因素，不外是政治环境、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与造纸印刷交通有关的科技

① 吴保丰在其《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中称浙江当时有广播电台8座，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一书在其第44页中也采用这一数字。因此有关全国广播电台的数字和浙江广播电台的数字都是不确切的。1931年，绍兴第一座无线电台陶乐广播电台开播，但是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邵梦龙主编：《绍兴新闻事业九十年》，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故本文未将其算入。

水平,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必需的但仍不够。以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根据常规,一家报纸要实行企业化经营,一要资本雄厚、能吸引住人才、所在地商业和交通较发达,二要有一定宽松度的、包括众多有一定文化的市民在内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14]所以新闻事业要发展,人的因素不能忽略。

1927—1937年,浙江发展新闻事业的环境虽然还有种种缺陷,不和谐的声音从未中断过,有的做法还未必合理合法。然而,与过去相比,却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为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新闻界积极参与并宣传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开放言论,保障人权”。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1933年8月和9月1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向各级党部、军政机关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浙江各地新闻界的响应,也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后又获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这是浙江新闻工作者为民国时期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贡献。

1935年9月1日是第一个记者节,杭州记者公会于9月1日至7日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展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25个省市的主要报刊(浙江各地有25种报纸参展),共有1455种早期、近期报刊参展,种类有日报、晚报、期刊、画报、影剧报、文艺小报、号外、特刊、报刊合订本、新闻学书籍、全国各报社和各地新闻记者公会送来的图表。各地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家、新闻爱好者与广大市民踊跃参观,许多人对展品摄影,作详细记录。^①1931年8月8日—10日,戈公振曾在杭州举办过中国第一次中外报纸展览会,但是此次报纸展览会是一次全国性的报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会是对中国报业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很有成效的公关工作或者宣传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展览会结束后,全部展品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借去,参加该系同年10月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展出,再次引起轰动。

如果说,古代浙江人才之盛,主要是指历代的科名仕宦,那么此时浙江人才中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实用人才,其中不乏创办和经营各种媒体的人才。事实上,浙江从来不缺媒体方面的人才,只不过他们都在京沪等地创业打天下。1927—1937年,浙江各方面的环境大有改善,他们愿意留在浙江发挥自己的才能,许多人甚至还来到浙江展现自己的才华,浙江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壮大,据1934年的一个统计,浙江新闻工作者有3000余人,江苏为1700余人。胡健中是浙江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典型,他祖籍安徽,上世纪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浙江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1932年任社长,将《杭州民国日报》和日后的《东南日报》打造成“国内第一流的大报”,^{[14](407)}发行量居全国前三四位,能与《申报》《新闻报》相抗衡。江苏省的报纸数量虽然超过浙江,却没有像《东南日报》这样的拳头产品。胡健中本人也被与《大公报》的胡政之相提并论:“北胡南胡,报坛双雄”。

为了提高浙江新闻工作人员的素质,1931年8月初,时为《时报》《申报》总编辑的戈公振受邀在杭州西湖罗苑举办了一期“杭州报学讲习所”,为浙江培训新闻工作人员。参加培训的人员还有浙江新闻界的知名人士项士元、王苏香、钟韵玉等。^②

浙江还有一可圈可点之事,即近代以来,浙江人士多认为报馆与议院、学校一样都是兴国之大纲,所以设立报馆应与建学校、设议院同时举行。这个思想在1927—1937年更受人重视了。“新闻事业是民众和社会底喉舌,大则足以转移时局,小则足以振聋发聩”,这是1929年7月1日《镇海报》的发刊词,很能说明浙江新闻界的使命感。因此,浙江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努力创办和经营好新闻媒体,另

① ②钟韵玉:《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杭州文史资料》(第2辑),第92-93页。

一方面还努力做好受众的工作，让受众了解新闻事业的意义。

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政府当局在各县建立收音点，如绍兴的上虞、新昌、诸暨、绍兴等县政府先后配置收音机，并有收音员负责收听记录，重要消息则缮写张贴广为传播。“省台”还在筹建的时候，各县就开始筹款装设收音机，选派收音员到省集训后回县专职收听广播。“省台”也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中山纪念台（现六公园附近）设立“公共传话机”，即有线广播站，有 200 瓦扩音机 1 台，50 瓦高音喇叭 3 只，用于转播新闻、学术讲演和播放音乐。^{[12] (464)}收音机是稀罕物，据 1930 年年底调查，杭州市区仅有各类收音机 357 台，因此杭州市区鼓励机关、团体、企业购置收音机。到 1936 年，收音机的数量大大增加，如宁波城内的收音机已经超过了 1000 台。^①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一批无线电修理行业和供应无线电材料的商店也应运而生，如宁波城内这时期就有 8 家这类的专门商店。

总之，1927—1937 年，浙江新闻事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当时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典型。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由各种因素促成，忽视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应该的。可惜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浙江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浙江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被打断了。在沦陷区，新闻事业更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浙江新闻事业的中心杭州，只有极少数新闻单位有能力随着政府机关撤退，绝大多数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均在杭州沦陷前停刊停播。这既是浙江新闻事业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极大不幸。

参考文献：

- [1]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 [M]．台北：中央日报编印，1981：94.
- [2]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 [M]．杭州：之江日报社印刷，1930：175.
- [3]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 [M]．台北：三民书局，1992：168.
- [4] 何扬鸣．老报人忆《东南日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298.
- [5] 徐运嘉等．杭州报刊史概述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85.
- [6] 邵力子．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 [A]．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22.
- [7] 林白．温州报刊史话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138.
- [8] 鄞县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97：816.
- [9] 本报三周年纪念 [N]．东南日报，1937-06-16（2）．
- [10] 吴保丰．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 [A]．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16-719.
- [11] 杭州市志（第 6 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464.
- [12]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4：23.
- [13] 本报特约电台广播时事要闻启事 [N]．东南日报，1937-08-05（1）．
- [14]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 [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334.

〔责任编辑：赵晓兰〕

① 葛广俊：《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宁波广播事业》，《宁波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124 页。